

# 《冰冻时光之窗》 与乌克兰幽默文学传统

□杨 靖

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一部诗集《反思》和两部19世纪乌克兰奇幻故事选集,也广受追捧。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他担任反主流的报纸《招贴报》和《后招贴报》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招致乌克兰文坛新法西斯主义和新民粹主义两大阵营的围攻。1996年,他出任《招贴报》主编并任职至今。

维尼楚克目前居住在利沃夫城郊结合部的维尼楚村,似乎有意无意地与乌克兰文学界保持距离。1990年代,维尼楚克最著名的小说是反乌托邦式的短篇《齐策岛》(The Island of Ziz)。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提出“反粪污化”的概念,其象征性隐喻无需解释,即允许热忱的乌克兰改革者以荒岛为试验场进行社会改造(作者对此不无讥讽);故事荒诞不经,但同时又深植于乌克兰独立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他在世纪之交时期的另一大成就是小说系列“利沃夫三部曲”:《利沃夫传奇》(1999)、《利沃夫酒馆》(2000)以及《利沃夫咖啡馆之谜》(2001)。此外,还有以女主角命名的小说《玛尔瓦·兰达》(2000)和故事集《冰冻时光之窗》(2001)。同时,他在国际文学奖项中也屡有斩获,如小说《秋园春趣》(2005)荣膺当年BBC年度图书奖。

故事集《冰冻时光之窗》的编选者、宾夕法尼亚大学乌克兰小说评论家及翻译家迈克尔·丹内认为,这一短篇故事集堪称作家代表作品的荟萃,可以全面展示作家创作的不同维度及其卓越才能。他根据主题和叙述手法,将维尼楚克全部作品分为五类。抒情短篇如《祖母的刺绣》(1996)和哲理小说《冰冻时光之窗》构思精妙,既充满诗意描画,也不乏崇高之美。评论家们的说法,作者是以悲喜交加的魔幻现实主义笔触刻画出了乌克兰历史的悲剧性及乌克兰人民的生存状态。在《那年飘香的苜蓿草》和《门铃》等小说中,维尼楚克作为擅长人性分析的病理学家,以冷峻的笔调深入人性至冥至暗处,挖掘其狰狞的一面。由此他的奇幻小说营造出另一个世界,既可视作为对当下的讽刺,亦可视为与当下的参照。借用什洛洛斯基“陌生化”理论,通过视角的转变,他创造出另一个现实——一个令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由此他为这一文学批评术语提供了绝佳的范例。这在《豌豆汤》《基里姆花床》和《规矩至上》等小说中有完美体现。

由于主题及叙事的多样性,维尼楚克的短篇故事无不引人入胜,尽管不同读者的兴奋点各不相同。当然,对西方读者而言,维尼楚克的小说借助于不偏不倚却又入木三分的讽喻,刻画出一个与客观现实截然不同的奇幻世界,或许这一点最令他们心驰神往。魔幻故事集《脉动标灯》是一个凄婉而哀伤的故事,讲述了外星人与地球公民接触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误解、冷落和暴力。《麦克斯与我》的故事则更加发人深省,它描摹了一个神经错乱、凶残残暴的资产阶级家庭,为快速致富而无所不为。这种资本主义式的贪婪与冲动所造成的恶果,正如作品中新贵企业家家族所展示的,是人变得贪得无厌以至于彻底丧失人性。整部小说堪称是对1979年前后乌克兰社会生活的绝妙讽刺。

跟他的乡贤果戈里一样,维尼楚克也是当代乌克兰一流的黑色幽默和怪诞派大师。照片显示出二人连外貌也惊人地相似,当然,这纯属巧合。维尼楚克的低俗小说能大行其道,本身也表明独立后的乌克兰文学界突破了之前的各种禁忌,获得了某种创作自由。小说《玛尔瓦·兰达》游走于禁忌与黑色幽默的边缘,一方面对公开场合恋童癖的刻画不无顾忌,一方面却又凭借高超的技巧将读者带入奇妙的梦幻世界。维尼楚克以厚颜无耻的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描画极富创意,在小说《秋园春趣》以及自传体的《梨煎饼》等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众所周知,在乌克兰文学长廊里,讽刺与幽默的笑声从未断绝。从果戈理、布尔加科夫、伊萨克·巴别尔到当代作家安德烈·库利科夫……这里是托尔斯泰名著《复活》的历史舞台;这里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成长的地方;这里也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出生地;正是在这里,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写下了蜚声世界的《红色骑兵军》。可见,即使在最为灰暗的年月里,乌克兰诙谐写作的传统从未间断,无论是历史的变迁,还是时局的动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喜剧的力量。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者,维尼楚克坚持认为这种幽默喜剧的背后有更为深沉的力量,换言之,即源自苦难的人生,也能滋生出诗意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维尼楚克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当成一个喜剧来读。随处可见的怪诞意象、闪烁在笑容背后的泪光和一种穿透表象抵达本质的微妙魅力,可以直接抵达人的心灵。从这个角度看,作家维尼楚克思想的深刻与复杂性又远非“黑色幽默”或“荒诞派”这样的称谓所能概括。正如曾经为果戈里做传的纳博科夫所说:当某个人告诉我,果戈里是一个“幽默作家”时,我立即明白,那个人对文学一知半解。

斯坦尼斯拉夫是乌克兰西南部小城,历史悠久,文教兴盛。自1662年建城,历经哈布斯堡王朝100多年统治,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乌克兰文化艺术之渊薮。上世纪90年代初,以传统东欧文化为特色、以西方后现代艺术为形式的文学思潮在该地逐渐兴起,尤里·安德鲁克维奇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认为“斯坦尼斯拉夫现象”这一术语是在乌克兰现实情境与西方后现代语境相结合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也可以说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的必然产物。随着这一思潮的影响日渐扩大,甚至有外地作家慕名而来,宣布自己加入这一阵营,如作家、诗人佩特罗山娅。包括维尼楚克在内的上述作家,以高超的讽喻技巧和一流的文学创作,为“斯坦尼斯拉夫现象”赢得了国际性声誉。

维尼楚克是不屈不挠的偶像破坏者和讽刺作家,跟古希腊作家诗人阿奇洛克斯颇为相似。他以笔为刀剑,对盛行于乌克兰的偶像崇拜和极权政治发起猛烈攻击,无论是政治方面的停滞还是民族性方面的倒退,都在他鞭挞的范围。巧妙的讽刺以及苦涩的冷嘲渗透在他几乎所有作品之中。以上列举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代表了乌克兰文学创作重获自由以来的第一代作家的最高水准。作家通过多声部叙事手段,以当下社会现实为基础,凭借文学想象创造出了一个奇幻世界。

此外,维尼楚克也是当代乌克兰一流的黑色幽默和怪诞派大师。照片显示出二人连外貌也惊人地相似,当然,这纯属巧合。维尼楚克的低俗小说能大行其道,本身也表明独立后的乌克兰文学界突破了之前的各种禁忌,获得了某种创作自由。小说《玛尔瓦·兰达》游走于禁忌与黑色幽默的边缘,一方面对公开场合恋童癖的刻画不无顾忌,一方面却又凭借高超的技巧将读者带入奇妙的梦幻世界。维尼楚克以厚颜无耻的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描画极富创意,在小说《秋园春趣》以及自传体的《梨煎饼》等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众所周知,在乌克兰文学长廊里,讽刺与幽默的笑声从未断绝。从果戈理、布尔加科夫、伊萨克·巴别尔到当代作家安德烈·库利科夫……这里是托尔斯泰名著《复活》的历史舞台;这里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成长的地方;这里也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出生地;正是在这里,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写下了蜚声世界的《红色骑兵军》。可见,即使在最为灰暗的年月里,乌克兰诙谐写作的传统从未间断,无论是历史的变迁,还是时局的动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喜剧的力量。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者,维尼楚克坚持认为这种幽默喜剧的背后有更为深沉的力量,换言之,即源自苦难的人生,也能滋生出诗意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维尼楚克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当成一个喜剧来读。随处可见的怪诞意象、闪烁在笑容背后的泪光和一种穿透表象抵达本质的微妙魅力,可以直接抵达人的心灵。从这个角度看,作家维尼楚克思想的深刻与复杂性又远非“黑色幽默”或“荒诞派”这样的称谓所能概括。正如曾经为果戈里做传的纳博科夫所说:当某个人告诉我,果戈里是一个“幽默作家”时,我立即明白,那个人对文学一知半解。

维尼楚克目前居住在利沃夫城郊结合部的维尼楚村,似乎有意无意地与乌克兰文学界保持距离。1990年代,维尼楚克最著名的小说是反乌托邦式的短篇《齐策岛》(The Island of Ziz)。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提出“反粪污化”的概念,其象征性隐喻无需解释,即允许热忱的乌克兰改革者以荒岛为试验场进行社会改造(作者对此不无讥讽);故事荒诞不经,但同时又深植于乌克兰独立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他在世纪之交时期的另一大成就是小说系列“利沃夫三部曲”:《利沃夫传奇》(1999)、《利沃夫酒馆》(2000)以及《利沃夫咖啡馆之谜》(2001)。此外,还有以女主角命名的小说《玛尔瓦·兰达》(2000)和故事集《冰冻时光之窗》(2001)。同时,他在国际文学奖项中也屡有斩获,如小说《秋园春趣》(2005)荣膺当年BBC年度图书奖。

故事集《冰冻时光之窗》的编选者、宾夕法尼亚大学乌克兰小说评论家及翻译家迈克尔·丹内认为,这一短篇故事集堪称作家代表作品的荟萃,可以全面展示作家创作的不同维度及其卓越才能。他根据主题和叙述手法,将维尼楚克全部作品分为五类。抒情短篇如《祖母的刺绣》(1996)和哲理小说《冰冻时光之窗》构思精妙,既充满诗意描画,也不乏崇高之美。评论家们的说法,作者是以悲喜交加的魔幻现实主义笔触刻画出了乌克兰历史的悲剧性及乌克兰人民的生存状态。在《那年飘香的苜蓿草》和《门铃》等小说中,维尼楚克作为擅长人性分析的病理学家,以冷峻的笔调深入人性至冥至暗处,挖掘其狰狞的一面。由此他的奇幻小说营造出另一个世界,既可视作为对当下的讽刺,亦可视为与当下的参照。借用什洛洛斯基“陌生化”理论,通过视角的转变,他创造出另一个现实——一个令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由此他为这一文学批评术语提供了绝佳的范例。这在《豌豆汤》《基里姆花床》和《规矩至上》等小说中有完美体现。

由于主题及叙事的多样性,维尼楚克的短篇故事无不引人入胜,尽管不同读者的兴奋点各不相同。当然,对西方读者而言,维尼楚克的小说借助于不偏不倚却又入木三分的讽喻,刻画出一个与客观现实截然不同的奇幻世界,或许这一点最令他们心驰神往。魔幻故事集《脉动标灯》是一个凄婉而哀伤的故事,讲述了外星人与地球公民接触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误解、冷落和暴力。《麦克斯与我》的故事则更加发人深省,它描摹了一个神经错乱、凶残残暴的资产阶级家庭,为快速致富而无所不为。这种资本主义式的贪婪与冲动所造成的恶果,正如作品中新贵企业家家族所展示的,是人变得贪得无厌以至于彻底丧失人性。整部小说堪称是对1979年前后乌克兰社会生活的绝妙讽刺。

跟他的乡贤果戈里一样,维尼楚克也是当代乌克兰一流的黑色幽默和怪诞派大师。照片显示出二人连外貌也惊人地相似,当然,这纯属巧合。维尼楚克的低俗小说能大行其道,本身也表明独立后的乌克兰文学界突破了之前的各种禁忌,获得了某种创作自由。小说《玛尔瓦·兰达》游走于禁忌与黑色幽默的边缘,一方面对公开场合恋童癖的刻画不无顾忌,一方面却又凭借高超的技巧将读者带入奇妙的梦幻世界。维尼楚克以厚颜无耻的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描画极富创意,在小说《秋园春趣》以及自传体的《梨煎饼》等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众所周知,在乌克兰文学长廊里,讽刺与幽默的笑声从未断绝。从果戈理、布尔加科夫、伊萨克·巴别尔到当代作家安德烈·库利科夫……这里是托尔斯泰名著《复活》的历史舞台;这里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成长的地方;这里也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出生地;正是在这里,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写下了蜚声世界的《红色骑兵军》。可见,即使在最为灰暗的年月里,乌克兰诙谐写作的传统从未间断,无论是历史的变迁,还是时局的动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喜剧的力量。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者,维尼楚克坚持认为这种幽默喜剧的背后有更为深沉的力量,换言之,即源自苦难的人生,也能滋生出诗意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维尼楚克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当成一个喜剧来读。随处可见的怪诞意象、闪烁在笑容背后的泪光和一种穿透表象抵达本质的微妙魅力,可以直接抵达人的心灵。从这个角度看,作家维尼楚克思想的深刻与复杂性又远非“黑色幽默”或“荒诞派”这样的称谓所能概括。正如曾经为果戈里做传的纳博科夫所说:当某个人告诉我,果戈里是一个“幽默作家”时,我立即明白,那个人对文学一知半解。

斯坦尼斯拉夫是乌克兰西南部小城,历史悠久,文教兴盛。自1662年建城,历经哈布斯堡王朝100多年统治,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乌克兰文化艺术之渊薮。上世纪90年代初,以传统东欧文化为特色、以西方后现代艺术为形式的文学思潮在该地逐渐兴起,尤里·安德鲁克维奇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认为“斯坦尼斯拉夫现象”这一术语是在乌克兰现实情境与西方后现代语境相结合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也可以说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的必然产物。随着这一思潮的影响日渐扩大,甚至有外地作家慕名而来,宣布自己加入这一阵营,如作家、诗人佩特罗山娅。包括维尼楚克在内的上述作家,以高超的讽喻技巧和一流的文学创作,为“斯坦尼斯拉夫现象”赢得了国际性声誉。

维尼楚克是不屈不挠的偶像破坏者和讽刺作家,跟古希腊作家诗人阿奇洛克斯颇为相似。他以笔为刀剑,对盛行于乌克兰的偶像崇拜和极权政治发起猛烈攻击,无论是政治方面的停滞还是民族性方面的倒退,都在他鞭挞的范围。巧妙的讽刺以及苦涩的冷嘲渗透在他几乎所有作品之中。以上列举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代表了乌克兰文学创作重获自由以来的第一代作家的最高水准。作家通过多声部叙事手段,以当下社会现实为基础,凭借文学想象创造出了一个奇幻世界。

此外,维尼楚克也是当代乌克兰一流的黑色幽默和怪诞派大师。照片显示出二人连外貌也惊人地相似,当然,这纯属巧合。维尼楚克的低俗小说能大行其道,本身也表明独立后的乌克兰文学界突破了之前的各种禁忌,获得了某种创作自由。小说《玛尔瓦·兰达》游走于禁忌与黑色幽默的边缘,一方面对公开场合恋童癖的刻画不无顾忌,一方面却又凭借高超的技巧将读者带入奇妙的梦幻世界。维尼楚克以厚颜无耻的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描画极富创意,在小说《秋园春趣》以及自传体的《梨煎饼》等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众所周知,在乌克兰文学长廊里,讽刺与幽默的笑声从未断绝。从果戈理、布尔加科夫、伊萨克·巴别尔到当代作家安德烈·库利科夫……这里是托尔斯泰名著《复活》的历史舞台;这里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成长的地方;这里也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出生地;正是在这里,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写下了蜚声世界的《红色骑兵军》。可见,即使在最为灰暗的年月里,乌克兰诙谐写作的传统从未间断,无论是历史的变迁,还是时局的动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喜剧的力量。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者,维尼楚克坚持认为这种幽默喜剧的背后有更为深沉的力量,换言之,即源自苦难的人生,也能滋生出诗意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维尼楚克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当成一个喜剧来读。随处可见的怪诞意象、闪烁在笑容背后的泪光和一种穿透表象抵达本质的微妙魅力,可以直接抵达人的心灵。从这个角度看,作家维尼楚克思想的深刻与复杂性又远非“黑色幽默”或“荒诞派”这样的称谓所能概括。正如曾经为果戈里做传的纳博科夫所说:当某个人告诉我,果戈里是一个“幽默作家”时,我立即明白,那个人对文学一知半解。

维尼楚克目前居住在利沃夫城郊结合部的维尼楚村,似乎有意无意地与乌克兰文学界保持距离。1990年代,维尼楚克最著名的小说是反乌托邦式的短篇《齐策岛》(The Island of Ziz)。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提出“反粪污化”的概念,其象征性隐喻无需解释,即允许热忱的乌克兰改革者以荒岛为试验场进行社会改造(作者对此不无讥讽);故事荒诞不经,但同时又深植于乌克兰独立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他在世纪之交时期的另一大成就是小说系列“利沃夫三部曲”:《利沃夫传奇》(1999)、《利沃夫酒馆》(2000)以及《利沃夫咖啡馆之谜》(2001)。此外,还有以女主角命名的小说《玛尔瓦·兰达》(2000)和故事集《冰冻时光之窗》(2001)。同时,他在国际文学奖项中也屡有斩获,如小说《秋园春趣》(2005)荣膺当年BBC年度图书奖。

## 关注

为纪念《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联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和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于11月8日至11日在绍兴市越秀外国语学院召开“回到源头:文学翻译与鲁迅精神”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越秀外国语学院书记费君清、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吴笛等在开幕式上致辞。陈众议在致辞中谈到《世界文学》与鲁迅的渊源,与《译文》的承继关系,并指出如今的《世界文学》仍在遵循鲁迅创办精品杂志的宗旨,高举五四文化先驱曾用血和泪浇灌过的那面旗帜,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他认为《世界文学》向世人展示的是世界文学的真实样貌,其中不仅有欧美文学,更有亚非拉文学,“一切真实的、美好的、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此次纪念《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的学术聚会称作“寻根之旅”,是“民族复兴的一枝迎春花”。

此次会议涵盖鲁迅思想、文学翻译、外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或影响等领域的议题。不少与会者探讨了鲁迅留下来的包括翻译理念在内的思想遗产。浙江大学教授聂珍莹以其文学伦理学批评武器,展开对《阿Q正传》的解析,其观点别开生面。他认为在鲁迅笔下,阿Q是农民中的先知先觉,是革命的坚定探索者,阿Q精神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探索革命的乐观精神,是中国宝贵的精神遗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栾松认为鲁迅的艰涩文章和清涩风骨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独特的“涩学”,对矫正当下文明弊端和治疗国民劣根性有一定借鉴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蒋永国将目光转向日本鲁迅研究,指出国内学界有必要将日本战前战后的鲁迅研究进行时空重构,这对贯通百年日本鲁迅研究、发掘其横向多样性以及认识日本中国学史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程巍着重讨论鲁迅的“硬译”思想和现代汉语的创造之间的关系,认为鲁迅使用“硬译”策略,是为了改造白话文,增强汉语对陌生文化的接受能力,进而改变和丰富中国人的感知方式。吴笛认为鲁迅所倡导的“硬译”或“直译”原则是对文言文翻译的颠覆。这种颠覆策略具有进步意义,背后有更深的考虑,即借助翻译来克服汉语本身的局限或弊端,充实汉语的表达形式,以实现文学语言革新、文化启蒙和思想深化的目的。

不少学者的发言涉及文学翻译形势分析、文学翻译理论、文学翻译家、具体作品的翻译策略等问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梁展对冷战与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文学翻译作了回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互译使世界文学这个战场发生了根本的形势转变。浙江财经大学教授章汝雯在会上阐述了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领域的研究,尤其对深化认识翻译与权力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宁波大学教授王松林从文学文体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李商隐的《无题》为检视对象,强调文学翻译要注重文化差异性和审美差异性,同时更要注重准确性问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李永平向与会者介绍了德国诗人里尔克对冯至创作的影响以及冯至翻译里尔克的心路历程。他指出冯至所写的十四行诗在意境和思想意味上与里尔克的十四行诗多有暗合之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戴潍娜简要介绍了周作人在古希腊文学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强调他与女诗人萨福之间的精神联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靖以当代乌克兰幽默小说家尤里·维尼楚克短篇小说集《维尼楚克的奇幻世界》的翻译实践为例,说明语用学中的会话合作原则以及关联理论可以帮助译者更准确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幽默元素,更忠实地传达原著的风格与精髓。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叶丽贤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但丁·罗塞蒂的十四行诗集《生命之殿》的几大音律特征展开分析。

不少与会者就外国文学研究的不同话题发表看法。南京工业大学教授陈世华对日本老年题材文学作了分类介绍,简要概括了不同年龄段作家的作品在思想意蕴和叙述形式上的特点,并强调这类作品对社会制度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卓指出整个英美诗歌现代派运动,无论意象派、客体派还是黑山派,在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时,都会回到东方文明去寻找可用的理论资源。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苏晖以“脑文本”为工具来解剖易卜生《社会支柱》的四个稿本,探寻其间的脉络。她认为这部戏的四个稿本是作家脑文本的“分身”,而稿本的变化是易卜生把脑文本解码成书写文本过程中伦理选择的体现。宁波大学教授段汉武认为《远大前程》对泰晤士河的描绘以及两个人物(流放犯马格韦契和海上寻梦者皮普)的经历都与19世纪英国的海洋帝国地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狄更斯小说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帝国意识形态建设。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张生珍从美国公民教育史出发来解读青少年文学在塑造青少年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塑造青少年的政治、公共伦理意识,培养他们对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世界的尊重。温州大学教授傅守祥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20世纪的世界文学,声称将“英雄崇拜”和“理想品格”内化为一种“责任”和“荣耀”,是20世纪世界文学在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大转型后依旧经典迭出的内在性和主体性因素。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俞建村简要勾勒了外国戏剧形式对中国话剧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越秀外国语学院讲习对中国、俄罗斯和西欧的文化著作中“风格”和“作者风格”概念作了对比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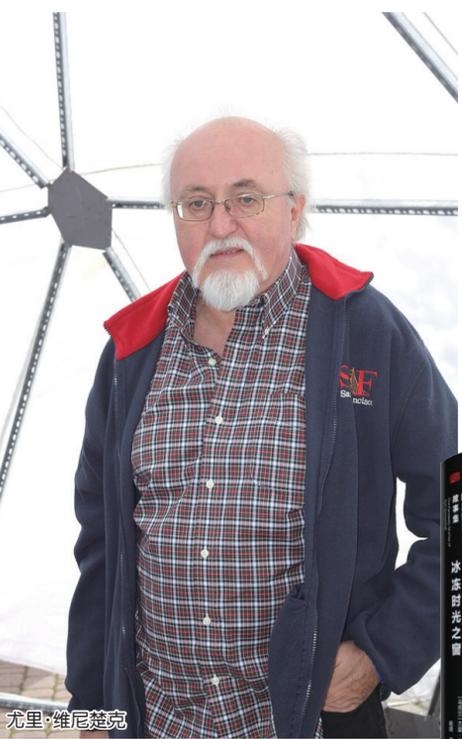
参与此次学术研讨会的还有作家、杂志主编和音乐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审沈念驹介绍了《译文》(《世界文学》的前身)创办的时代背景和译坛状况以及《译文》与鲁迅、茅盾、黄源等人的关系。《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认为《世界文学》向中国人打开了一扇展望经典的窗口,为中国人提供了世界意识以及跨文明交流的形式,正与《花城》一道推动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明的大潮。诗人汗漫在谈话中肯定了翻译家对推动汉语更准确客观地表达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认为《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开放性、先锋性建设的意义。他指出:“正是翻译,一点一点更新了汉语的、或者说中国的灵魂和容颜。通过翻译家的工作,那些异域他种种崭新的词汇、语式、言说,使汉语乃至汉人的生活,不至于因陈腐而灭亡,反而通过混血而生动有力。”音乐人钟立风以《字吸,歌呼》为题,谈到了自己与《世界文学》的邂逅,外国文学对其音乐创作的滋养。

此次研讨会既有学者的理性批评,也有创作者的感性坦言;既有对异域文学的探析,也有对中国文学的再回首;既有翻译理论家的宏观评点,也有文学译者的微观考量;既有对鲁迅等五四前辈筚路蓝缕之功的肯定,也有对未来“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展望。正如《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在会议总结中所说,“此次研讨会充满了严谨规范的学术气息,同时又有迷人的文艺色彩。在《世界文学》的老主编鲁迅的故乡举办纪念创刊活动,本身就具有精神和灵魂意义。”

学者周启超、傅守祥、苏玲、徐德林分别主持了各场大会发言。(叶丽贤 傅燕晖)

## 回到源头:文学翻译与鲁迅精神

——纪念《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暨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尤里·维尼楚克

在欧美人士眼中,大名鼎鼎的尤里·维尼楚克可谓当代乌克兰文坛的传奇人物。1952年,他出生于乌克兰文化艺术中心斯坦尼斯拉夫城,此一外省城市一度汇聚了尤里·安德鲁克维奇、尤里·伊兹德里克、塔拉斯·普罗科哈斯科等一批中青年作家,乌克兰文学批评家由此将之命名为“斯坦尼斯拉夫现象”。1970年代初,尚在大学求学期间,维尼楚克便开始地下文学创作。1973年,维尼楚克从斯坦尼斯拉夫教育学院毕业,在此期间,他参与的学生刊物及地下出版物已小有名气,甚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被迫四处流亡。

流亡期间,因为长得像巴尔干人,乌克兰语又讲得怪腔怪调,维尼楚克于是自称是来自南斯拉夫的学者,由此不仅能继续他的文学创作,还能时常抛头露面做演讲,很长一段时间居然没有被人识破。而在此之前,他只能用假名或冒用已故作家之名,以便于领取稿酬。不知是出于谋生需要还是有意为之,他将这一积习保留至今。维尼楚克时常自夸:在此期间,迫于生计,他谎称其诗作乃是由古老的凯尔特语“翻译”而来,由此骗过审查官。后来更是变本加厉,“翻译”了若干“阿卡努米亚”史诗和抒情诗——当然,该国在地球上从来也不曾存在过。

维尼楚克最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色情文学领域的成就。被冠以“低俗小说”恶名的《黑夜少女》(1992)出版以后引起轰动,几乎可以说是一夜成名,但同时他本人亦领教了成名之艰辛,日夜不得安宁:以“妇女之友”为代表的社会正统人士和保守势力白天在他的寓所周围集会声讨;而到了夜晚,年轻的粉丝和拥趸同样又会在此集结,以示声援——至于“妇女之友”们,此时大多已赶着回家收听或收看由小说《黑夜少女》改编而成的广播剧和连续剧。

维尼楚克自认为他成就最大的色情小说非《后宫纪事》(1996)莫属。该书以自传形式讲述奥斯曼帝国号称“东方最伟大的皇后”罗克索拉纳的爱情传奇。作者声称在历史档案馆无意中发​​现失散数百年的皇后的手稿,经过考证,证明皇后具有高贵的乌克兰血统,只是由于战乱才被沙里曼苏丹掳掠到土耳其。作者言之凿凿,读者也拿它当历史小说,再加上活色生香的异国情调,一时间维尼楚克竟一跃而成乌克兰头号畅销作家。

## 动态

### 让·马克·图里纳《河的女儿》 获“五洲文学奖”

中国翻译家许钧应邀担任该奖评委

日前,比利时作家让·马克·图里纳的《河的女儿》一书获得了第十七届“五洲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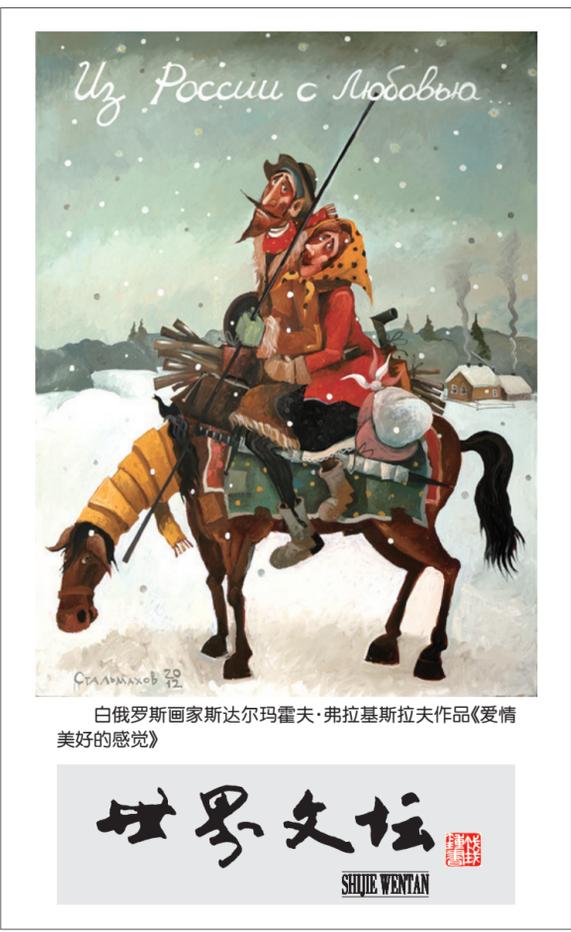
“五洲文学奖”由国际法语国家组织创设。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成立于1970年,现有58个成员国和26个观察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1年,为进一步推进文化与文学交流,开展文学对话,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国际法语国家组织设立了“五洲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奖励用法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五洲文学奖”评委会采用常务委员制,由来自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的著名作家组成。

第十七届“五洲文学奖”共收到世界各国出版社推荐的参评小说131部,经由法语国家青年作家家协会、塞内加尔作家协会等五家文学协会组成的审读委员会评审,于2018年7月28日共选出10部作品参加终评。这10部候选作品的作家来自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士、阿尔及利亚、美国、伊朗、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等9个国家,显示了“五洲文学奖”的国际性。

浙江大学文教授、翻译家许钧应邀担任此次“五洲文学奖”评委,赴法国巴黎参加了评奖与文学交流活动。此届文学奖评委会由12位委员,其中有100岁高龄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戏剧家热内·德·奥巴尔迪纳,具有法国和毛里求斯双重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加拿大籍的魁北克人文科学院院士、小说家利兹·毕索内特,出生于黎巴嫩的法国诗人维纳斯·古丽-嘉塔等,评委会主席由法国女作家波拉·雅克担任,她同时也是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的评委。许钧是评委会中惟一一位来自非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的翻译家,评委会主席波拉·雅克在致辞中表示,许钧的加入“显示了五洲文学奖的开放性,也提升了五洲文学奖的国际声誉”。作为“五洲文学奖”评委会的新成员,许钧在评审中以翻译家与中国读者的双重视角,从作品的文学性、文化价值与思想性等三个维度阐述了他心目中“五洲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引起了评委会的普遍共鸣。

在评委会上,评委委员们各抒己见,观点不一,评审异常激烈,先后进行了5轮评选。在决定获奖作品的第5轮投票前,许钧强调文学作品的接受性与翻译传播的可能性,力荐《河的女儿》一书,得到了勒克莱齐奥的响应,最终《河的女儿》以一票的优势荣膺第十七届“五洲文学奖”,而加拿大作家斯特法妮·克莱蒙的《音乐之游戏》获得特别奖。

第十七届“五洲文学奖”借国际法语国家组织峰会召开之际,于10月9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颁奖仪式。受评委会委托,许钧为《河的女儿》一书撰写了颁奖词:“如果看不见是因为熟视无睹,那么解放自身的历程之奥秘,构建的便是一条从看得见的乡土通往不可见的家国之路。敏感而不屈的灵魂,应和着丰沛而无尽的河流。《河的女儿》一书以其透溢的人文主义和诗意打动了评委会,展现了颠沛流离之人遭受迫害和抛弃的悲惨而漫长的道路。”(世文)



白俄罗斯画家斯塔达尔玛霍夫·弗拉基斯拉夫作品《爱情美好的感觉》

世界文坛  
SHIJI WENYUAN